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组编

遵义会议研究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80 周年

杨河 赵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组编

遵义会议研究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80 周年

杨河 赵军◎主编

K264.407
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遵义会议研究/杨河,赵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301-25562-9

I. ①遵… II. ①杨… ②赵… III. ①遵义会议(1935)—文集 IV. ①K26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779号

书 名 遵义会议研究
著作责任者 杨 河 赵 军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56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2.5印张 356千字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编委会

主任：李卫红

副主任：张东刚 杨 河 赵 军

薛庆超 徐 静 孟曙初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忠 王 刚 王 婧 吕延勤 朱喜坤

李佑新 李建强 邱小云 张泰城 林尚立

房 正 袁利民 徐青森 崔智林

前 言

杨 河 赵 军

80年前，在伟大的红军长征路上，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极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决议指出：“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开始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艰难险阻，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在于，我们党要成为一个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坚强、组织上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才能实现全党的高度统一和坚强团结，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顽强拼搏、接续奋斗，完成和推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二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

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三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2015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利用这个契机，深入开展遵义会议历史研究，广泛宣传遵义会议伟大精神，对推动高校党史研究教育宣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开展遵义会议研究宣传，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遵义会议研究宣传。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史论结合，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与领袖人物的范文，也是指导党史研究教

育宣传的重要文献。开展遵义会议研究宣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史观，全面、历史、辩证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自觉抵制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二是把遵义会议研究宣传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发挥好党史育人功能。遵义会议时期党的历史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等多种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独特，形象生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学习了解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使青年学生真正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真理，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健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是要把遵义会议研究宣传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好党史的资政功能。党的历史是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在今天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要把党史研究宣传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结合起来，从党史中汲取丰富营养和智慧，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杨 河 赵 军 (1)
遵义会议历史地位新论	薛庆超 (1)
遵义会议与党的制度文化建设	徐 静 (13)
遵义会议：党的建设的里程碑	全 华 (20)
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田克勤 (26)
党的建设视野下遵义会议的价值及意义	丁俊萍 胡永干 (39)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节”能力	杜艳华 孙 鹏 (50)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	钟日兴 (60)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	杨 勇 冯 霞 (68)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维才 (77)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	黄 刚 (84)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敬煊 邹 谨 (94)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莫志斌 (102)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突破	谭献民 肖俊成 (111)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伟大实践	易新涛 陈 霞 (119)
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在转折关头的危机意识	李海新 (129)
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陶厚勇 高晓林 (138)
遵义会议决议存疑考证	李方祥 郑崇玲 (148)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系列会议研究	王纪鹏	(159)
论遵义会议的三大标志性转变	苑申成	(169)
“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	林茂前	(176)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黔北的政治工作述论	裴恒涛	(183)
遵义会议与整风精神	董振平	(198)
遵义会议与中共土地政策转变	孙宝根	(206)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费侃如	(214)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确立的 史实考证	王凤贤 张 磊	(226)
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	李 强 杨生风	(237)
毛泽东的四个过人之处是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	李久林	(245)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楚向红	(254)
从苟坝会议看毛泽东的党内斗争艺术	张 勇	(262)
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	李方祥	(270)
毛泽东谈遵义会议	刘明钢	(278)
周恩来与遵义会议	冯雅新	(286)
朱德与遵义会议	冯雅新	(293)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杜 君 王成元	(299)
陈云与遵义会议新探	郭永虎	(308)
陈云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张海燕 蒋建军	(317)
遵义会议前后博古的心路历程	张志永 王玉平	(325)
批评与自我批评：遵义会议的一笔精神财富	潘可礼	(337)
析“遵义会议诗”三首	张小灵	(343)
后 记		(351)

遵义会议历史地位新论

中央党史研究室 薛庆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党和红军的强烈要求、与会同志的积极努力，特别是毛泽东卓越的政治远见、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军事基础，在党史上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一、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王明于1931年秋天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由博古即秦邦宪主持中央工作）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经过长征初期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准备，遵义会议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客观困难，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组织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重点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今后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凯丰（何克全）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则拒绝接受批评。出席遵义会议的陈云在传达会议精神时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①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②

^①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遵义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①扩大会完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决议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②遵义会议的上述重要决策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继续长征途中，2月5日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长征中，各种军事情况瞬息万变，中央对红军的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长征中，新的“三人团”具有红军最

^①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42页。

高统帅部的职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军事工作方面，他是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同时，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所确认；特别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并被中共中央肯定，因此，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已处于核心地位。对此，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在军事方面由周恩来负责（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草地地区，由于周恩来病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并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会见中共中央代表时对毛泽东进行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认，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遵义会议解决了事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鉴于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生存问题；而且长征以来，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已经为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实践中觉悟到了，迫切要求批判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因此，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

来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这样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瞻远瞩、策略上的深谋远虑，也是遵义会议和会后继续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遵义会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周恩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①

^①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原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完全必要。但是，随着中国革命深入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随着中国阶级斗争形势日趋激烈复杂，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的指导越来越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遵义会议在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起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和解决党内问题的起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认识到确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

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没有形成团结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走了一路，争论了一路，吵架吵了一路，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没有找到长征的终极目的。遵义会议后，既形成了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按照具体情况决定长征方向，也团结了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

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①在团结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方面，遵义会议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张闻天曾经是“左”倾错误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一经认识了错误，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立即满腔热情地予以欢迎，并和其他同志一起，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对于暂时没有认识错误的博古、凯丰（何克全），也保留他们分别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耐心等待他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②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毛泽东这种以全党团结为重、以中国革命大局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同“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样，有利于全党同志在患难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对此，有的历史亲历者回忆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③对于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历史贡献，毛泽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曾经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的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

①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原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②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原载《毛泽东传》1893—1949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③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